



李 维

建城以来史

前言 · 卷一



李 维

建城以来史

前言·卷一

穆启乐 (F.-H. Mutschler)

张 强 付永乐 王丽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古罗马)李维(Livius, T.)著. 穆启乐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日知古典丛书)

ISBN 7-208-05463-0

I. 建... II. ①李... ②穆... III. 古罗马—历史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8856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姚映然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建城以来史 前言·卷一

[古罗马]李维 著

穆启乐 等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125

插页 3

字数 119,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463-0/K·1088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 1 译者序
- 17 建城以来史·前言
- 23 建城以来史·卷一
- 152 译者注
- 155 译名对照表

译者序

T. 李维 (Titus Livius) 撰写的《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 第一卷, 是保留至今惟一一部出自罗马人之手详尽记载古罗马早期历史的著作, 因此有着特殊的史学价值。

李维的生活背景

关于作者李维的生平, 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据哲罗姆 (Hieronymus) 记载^[1], 他公元前 59 年出生在帕塔维乌姆城 (Patavium, 现在的帕多瓦), 公元 17 年在那里去世。关于他的生卒年代, 史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倾向于将李维的生卒年提前 5 年。至于李维的家乡帕多瓦, 这是确认无疑的。这座富裕而有些保守的小城的文化特点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以致当时文学界的权威阿西尼乌斯·波里奥 (Asinius Pollio) 对他带有过分的家乡特点 (Patavinitas) 颇有微词^[2] (当然, 尚不能确定波里奥是仅指他的语言风格, 还是泛指他的世界观, 抑或人生观)。

对于李维的社会关系, 至今也还是大多出自猜测。他的家庭肯定属于当地的上流社会。但据我们现今所知, 他的家庭成员中并无一人在仕途上有过功名。李维本人也同样如此。他显然具有上流社会惯有的雄辩与哲学修养, 但并不醉心于仕途; 相反, 他

译者序

却选择了著述生涯。塞涅卡（Seneca）曾提到李维的哲学对话^[3]，此外，李维还曾有过一封给其儿子的信，阐述的是修辞问题^[4]，可惜这些都未能保留下来。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他一生所倾心尽力的是公元前30年左右开始撰写的《建城以来史》。这部著作的第一至五卷，李维也许在公元前27年曾单独发表过；直到晚年，他撰写了至公元9年的罗马历史著作，凡142卷。

李维的撰写工作部分是在罗马进行的，这使他有可能会接触罗马皇室。据塔西佗（Tacitus）记载，由于李维对庞培（Pompeius）有正面的描写，奥古斯都（Augustus）称他是庞培的追随者，“不过他们的友谊并未因此而受损”。^[5]据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载，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年轻时曾受李维的启发而撰写过历史。^[6]

我们对李维全部生活的了解仅此而已；对其历史著作的特点及意义作出评价，则首先需了解李维之前罗马史学的状况。

李维以前的罗马史学

据西塞罗（Cicero）和塞尔维乌斯（Servius）记载，在早期，大祭司年复一年地将重要国事予以记载，并将记事板收集起来。毋庸置疑，当时神职人员确实进行过“编年史”（Annales）的工作。问题是这类工作是否与真正的史学有相通之处。答案可能多半是否定的。当然，很可能这些神职人员的编年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作为了解历史的依据。但可能性同样很大的是，第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不仅从内容上较少地，而且从形式上更少地受益于这类编年史。Q. 法比乌斯·皮克托尔（Q. Fabius Pictor）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危机时期（公元前218—202年）曾肩负着国家重任。作为罗马显赫家族的成员，他试图通过一部希腊文的历史

著作将罗马及其政策介绍给希腊世界。这部《编年史》著作迄今只有断片保存下来。它首先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开始，对王政时代做了详尽的描述，然后提供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一些画面，最后详尽描述了第一、第二次布匿战争。

法比乌斯通过把神话与当代史联系在一起这一对罗马史的构思，开创了一个传统。不仅那些像他那样用希腊文写作的后继者^[7]，而且那些在同一世纪 40 年代使用拉丁文的罗马史家 L. 卡修斯·赫米那 (L. Cassius Hemina)、Cn. 盖利乌斯 (Cn. Gellius)、L. 卡尔普尔尼乌斯·比索 (L. Calpurnius Piso)，都采用了法比乌斯的写作方法。

相反，第一部拉丁散文体历史著作——M. 波尔西乌斯·加图 (M. Porcius Cato) 的《起源》(*Origines*，大约写成于公元前 150 年)——除使用拉丁文外，未产生过影响。加图著作的特点在于涉及整个古意大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记述的非连贯性（从题目“*Origines*”的复数性可以看出，这部著作不仅记载了罗马早期历史，而且还记载了其他古意大利城市的历史），不是以首领而是以罗马平民所作出的贡献为记述重点，这些特点并无后例。

正是在那个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产生了史学中富有成果的革新。

小西比阿 (Scipio) 之友莱利乌斯 (Laelius) 的女婿法尼乌斯 (C. Fannius)，虽也重新写过自特洛伊开始的编年史，但对其残稿的分析可以推断，他的主要侧重点还是在当代史，而且，他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看作内政史，并对内部权力斗争记述得非常详尽。

比他稍年轻的同时代人塞姆普罗尼乌斯·阿塞利奥 (Sempronius Asellio，公元前 134—133 年于努曼提亚担任指挥官，卒于公

译者序

元前 91 年以后) 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他是罗马史学家中第一个局限于记载自己所处时代历史的人。他的认识兴趣也与编年史撰写者不同。他指摘他们满足于对枯燥的历史时间的编年排列。他认为, 重要的是“揭示目的和原因, 描述元老院和平民所作的决定以及他们决定行此事彼的动机”^[8]。这里, 波里比阿 (Polybius) 的影响很明显: 重要的不是一味地热衷于昔日的历史, 而是对近代和当代各种政治力量的理解。

第一位不属于元老阶层的罗马史家 L. 科埃利乌斯·安提帕特尔 (L. Coelius Antipater) 亦开辟了一条道路。他著有一部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专史。其中, 他虽然一方面尊重史实, 但另一方面似乎较少注重对读者的教益而更多注重调动读者的情感。

这些历史写作的新旧形式在公元前 1 世纪曾繁荣一时。

一方面, 所谓的新编年史家继承了编年史的传统。C. 李西尼乌斯·马塞尔 (C. Licinius Macer, 公元前 74 年任执政官, 公元前 66 年自杀), 克劳狄·克瓦德里盖里乌斯 (Claudius Quadrigarius) 和瓦雷利乌斯·安提亚斯 (Valerius Antias) 被指摘践踏了罗马历史的传统。这种指摘不无道理。这三个人不负责任地填补了早期罗马共和国历史传统的缺失, 以对罗马军事成就的过分夸张, 以按他们所属时代的纷乱对内部争斗的描写和以对他们各自家族成员的所谓英雄事迹和功绩的鼓吹填充历史。

另一方面, 几乎和新编年史家同时期, 颇有声望的政治家和雄辩家 L. 科尔内利乌斯·西塞那 (L. Cornelius Sisenna, 公元前 118—前 67 年) 作为阿塞利奥的后继者撰写了当代史。除了以比较保守的观点和较高的修辞手法描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纷争外, 对他的《历史》(Historiae) 我们作不出更多的评价。

C. 萨鲁斯特·科里斯普斯 (C. Sallustius Crispus, 公元前

李维写作的动机和目的

86—前 35 [?] 年) 同样使用过历史创作的新形式。他创作的三部作品中有两部全部保留了下来, 第三部为摘录。从形式上, 三部作品的区别在于: 头两部《卡提林那阴谋》(*Bellum Catilinae*) 和《朱古达战争》(*Bellum Iugurthinum*) 是专史, 局限于具体事件, 而第三部《历史》(*Historiae*) 则作为当代史记载了公元前 78 年至 67 年的事件。然而,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把所描写的有时间局限性的事件视为罗马全面而深刻的危机的体现, 并把这种危机归根于道德原因。

综上所述, 有一点应该是明显的, 即李维开始从事历史撰写工作时, 在已有的形式中已有选择的余地了。其中罗马史从开始至当代的编年体通史是最古老也是最受推崇的。但是, 直到公元前 2 世纪才出现当代史和专史的著述形式。萨鲁斯特的著作证明, 使用这两种形式, 可以创作出叙述与分析引人入胜的作品。不过, 李维选择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过时的罗马均史形式。他如此选择的原因, 可见于其著作中的前言。

李维写作的动机和目的

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可分为两段 (1—5; 6—13)。第一段阐述了促使李维总体上描述罗马建城以来历史的动机。令李维感到棘手的是: 一直有新史家承担这项工作, 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能超过其前辈 (2); 此外, 这一工作巨大, 并且谁一旦从事这一工作, 那么他至少在记述罗马早期历史时, 不能指望读者对它发生兴趣 (4)。有两个因素帮助李维克服了他对自己努力得不偿失的怀疑。其一, 他的著作将对回忆世界上这一伟大民族的业绩作出一份贡献 (3); 其二, 记述早期历史可以此避开时弊 (5)。显然, 这两个因素相互矛盾, 并揭示了李

维认识罗马的一种奇特的两重性：一方面，罗马之伟大不容置疑，使他引以为豪；另一方面，当时罗马的不少弊端令他厌恶。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两者促使他选择撰述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而不是专史或当代史。毫无疑问，综观罗马的历史，若在总体加以描述的话，将会深刻之极。若要与时弊保持一段距离，那么，撰述罗马早期的历史便不失为最佳的选择。

前言的第二段与第一段紧密相关。李维首先阐述了记述传奇般早期历史的困难。他的态度是对传说不加以证实也不予以否定（6）。他认为，可以宽宥各民族对其起源通过神人结合加以粉饰。就罗马民族而言，尤为如此（7）。李维在这一点上如此宽容的原因在于，他的重点并不在此（8）。他想要传达并促成对历史的理解，而对他来说，对历史的理解即是认识历史发展的道德原因，具体是指：他希望使读者注意并认识罗马兴旺的基础在于道德的强盛，而道德的衰败则可能是罗马政权衰败的根源（9）。在此，李维认识罗马的两重性再次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李维也不单想要传达对历史事件理智的理解。他认为，读者可从中得出他们自己的行为指南：历史的记述给他们提供了可仿效的或应避免的例证（10）。罗马历史在道德上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因为它提供的更多是正面的例子，而且较晚地产生各种罪恶（11—12）。由此可见，从对读者施以影响这一角度而言，李维也应选择总体描述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作为他记载历史的形式。在李维开始写作之前，萨鲁斯特在其著作的前言和离题说明中即已表明，罗马基于道德而兴衰的这一思想模式在专史和当代史里也可得以揭示。但抽象地设计这一思想模式，不如让读者自己从总体记述罗马历史发展来概括出这一模式，或者，至少可以考察出这一模式是否合适。而且，史家若要不仅通过反面的例证使人弃恶，而且通过

第一卷：史料

范例使人从善，他就不能错过那一典范例子众多的历史时期，即罗马早期历史时代。

所以，总体记述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是李维历史写作动机和目的的最适当形式。

第一卷

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前言与其全部著作有关，但有几处特别涉及到对罗马早期历史的记述。要理解第一卷，首先必须注意李维对传说的历史价值和他自己的历史方法论的论述（6—7）。李维声明，他已意识到早期罗马传说的不可靠性。他知道，这些传说中史实与传闻混杂在一起。但他同时又声明，即使这样，他也无意对这些传说做出证实或否定的历史批评。其次，他对历史记述的目的的一般论述一部分是特别针对早期历史的（9—12）。在记述早期历史时，他也注重从道德上寻找成功与失败的根源。与他著作后一部分不同的是，这里每个人可仿效的正面例子占主导地位。最后，我们以这两点进一步分析一下第一卷。

第一卷：史料

如前所述，李维的《建城以来史》第一卷是迄今所保存的有关罗马早期历史最详尽的拉丁文记述。和古希腊狄奥尼修斯（Dionysius）的《罗马的古代》一样，是有关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作为史料，它的真正价值是什么？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首先必须解决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李维使用了哪些史料？第二，他是否对这些史料进行过严格的筛选？

关于李维所使用的史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与今天的史学研究一样，他同样没有罗马早期历史的文献可供参考，并且，当

译者序

时还没有具有科学性的考古学。因此，当时每个史家首先依赖的只能是二手文字材料。它的两种表现形式为：文物家和史家的著述。这两类作品的第一类，特别是瓦罗（Varro）的研究，李维似乎基本没有使用。这一点被指摘为他的一个缺欠。按我们今天对历史研究的理解，这也不无道理。另一方面，对此最为谙熟的专家最近指出，李维特别感兴趣的记述事件的历史，确实很少能从瓦罗这样人的著作中得到什么启示。对李维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他之前的罗马史家著作。他是否最大限度地借鉴了这些著作？对这一问题，现代学术界长期以来倾向于否定的答案，并且认为，李维首先借鉴的是他直接先辈苏拉（Sulla）时代的编年史家，而忽略了此前的罗马史家；即使李维明确地提到过法比乌斯或卡尔普尔尼乌斯等人，人们还是认为，他没有直接引用这些人的著作，对他们的有关材料的引用是间接的，即取材于安提亚斯或克瓦德里盖利乌斯等人的著作。但是现代，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李维对材料进行过全面考证并研究过大部分前辈人的著作。在他提及这些著作之处，可以相信他对这些著作的了解是直接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至少在他早期著作中，尤其在第一卷中更与实际相符。李维在创作开始阶段一定非常勤奋，决心要将他的撰述建立在尽可能全面的材料基础之上。

即使我们从这一事实出发，即李维不但研究了新一代编年史家的作品，也研究了老一代前人的作品，那么，自然也带来一个问题，他是不加选择地使用了这些史料还是对它们进行过严格筛选？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如他自己在前言中言明的，对最早期的传说不想作出历史性的评判。但无论如何，从第一卷的几处可以看出，他对王政时代的传说有多少真实性曾试图作出区分。所以，对李维来说，在所选史料的评判过程中，历史的可信性还

是占有一定位置的。不过，他还不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历史评判能力也不是他有别于其罗马前辈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建城以来史》第一卷也不过是一部史实性和传闻性相结合的著作，而且并没有将罗马传统经过严格净化而提供给我们。但由于他的文学才能，其著作排斥了前辈的作品，成为最充分向我们展示罗马传统的拉丁文著作。这就构成了它作为历史素材所具有的特殊价值。虽有传闻的成分，但罗马传统——如果与其他材料一起使用——还是向我们提供了其早期历史有价值的线索和不可缺少的见证。

在此举两个例子。罗慕路斯（Romulus）统治时期的一个著名事件是年轻的、几乎只由男性公民组成的团体劫持萨宾妇女。李维详尽地、富有戏剧性地描述了从劫持计划、准备工作到由劫持带来的战争纠葛，直至最终和解以及两个民族结合的全部过程。当然，整个事件只是一个具体细致而无任何史实性的传说。尽管如此，这一故事关键之处却与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考证结果一致。这一考证结果也提到了两个习俗、语言不同的部落在罗马早期的结合，这两个部落很可能就是拉丁族与萨宾族部落。李维所保存下来的罗马传统和现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这一点相互印证。

第二个例子更应该说是李维的记述和现代学术界的研究相互补充。一个至今还颇有争议的问题是王政统治的结束，以及伊达拉里亚人的被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这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并把日期定在公元前 510 年。此后，考古学的研究结论表明，伊达拉里亚人在罗马的影响不能说是在公元前 470 年以前已经削弱或甚至于消灭。基于这一点，有观点认为，伊达拉里亚人的被逐和王政的结束定于这个时间是有道理的。不过，正确的方法很可能将这两件事区分开来，这也是古罗马传统和现代考古学

译者序

兼而考虑的惟一方法。如果稍加仔细地阅读李维的记述，就可明显看出，即使事件发现具有小说性形式，还是没有把驱逐国王描述成罗马民族对所有伊达拉里亚人的反抗，而是罗马—伊达拉里亚贵族阶层反抗暴君塔克文（Tarquinius）和他的直系亲属。这种针对王和王政体制的暴动确实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并且它不排除，而却是相反，包括了罗马当时伊达拉里亚成分的延续。考古学将伊达拉里亚成分的削弱及最终的消失定在公元前470年后，这一考证的结果可以毫无疑问地与此联系起来。如此，李维《建城以来史》第一卷再次表现出我们复原罗马早期历史时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第一卷：历史叙述

《建城以来史》第一卷除其史料价值而外，在文学形式、思想内容方面也是对罗马早期历史的生动描述。进一步分析前面所谈及的两个故事，会得出比这一描述更清楚的画面。而把它们与希腊同辈史家狄奥尼修斯的记述加以比较，李维叙事艺术及思维方式的特点会越来越明了。

首先是劫持萨宾妇女。若我们把狄奥尼修斯（《罗马的古代》，2.30—47）与李维（《建城以来史》，1.9—13）的两段记述加以比较的话，会立即发现一个普遍的但却是重要的区别：狄奥尼修斯的记述比李维长得多。那么，这一区别的原因何在？有两点显而易见：狄奥尼修斯比李维更注意政治与军事的细节；比其罗马同行更热衷于探讨罗马传统中的分歧之处（35，关于凯尼那人及安特姆奈人失败后的政治调整；37，关于萨宾人交战前的外交活动和军事准备；41—44，关于反抗萨宾人的两场战役、以后的会议；以及在31，38—40中，关于学术问题冗长的讨论；所有

这些段落李维的记述中没有或仅有片语只言)。狄奥尼修斯表现出的是学者，所关心的是细节，对传统中分歧之处的批评讨论感兴趣。然而，即使李维在细节上描写不完全，对史料来源阐述很少，不如狄奥尼修斯，但其叙事的简洁未必为过。他自己叙述方法的益处可以在他描述罗马人与萨宾人之间的战争与媾和中看出。在狄奥尼修斯那里有两场战役（41—43）和以后的各方会议（44）展开描述；萨宾妇女出现在罗马元老院前，是她们自作主张作为某种使节首先达成休战，而后订立了友好协定（45—46）。而李维则把两场战役捏合成一场（12），并让妇女介入的不是会议，而是——在充满感情和激情的情景中——战役本身，随后当场便举行了和平仪式（13.1—5）。无须再作仔细分析，从与狄奥尼修斯记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李维的叙述具有集中和戏剧性的特点。

至于这一故事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同样有趣的区别。差异之一涉及到两位史家对人物动机的处理。对狄奥尼修斯来说，人物决定性动机贯穿在集体安全和繁荣的考虑之中。就诸邻邦而言，甚至在遭劫持后的那一刻也是这样；狄奥尼修斯称他们的怒火与义愤是个借口，拙劣地伪装起他们敌对反应的真正原因，即对罗马势力增长的关注（32.2）。相反，李维更多地强调情感，其中最重要的如痛苦、愤怒和义愤（9.6：“痛苦地忍受”；“内心的痛苦”；9.13：“悲哀地”；“谴责友好协议被践踏”；9.14：“没有更多的希求，而愤怒也未减少”；10.1：“满腔抱怨地鼓动着各邦”；“愤慨”；10.3：“热望与愤怒”；13.2：“怒火”）。这一般性观念的不同与两位史家介绍该故事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罗慕路斯的差异有关。就两位史家而言，罗慕路斯是一个理想、典范的首领，但这在李维和狄奥尼修斯那里所指并不同。狄奥尼修斯笔